



图①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民警在研究检材。
图②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民警吴玉剑在犯罪现场取证。
图③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主任方慧做检测。

袁野 摄

实验室有一群让DNA作证的“白大褂”民警

□ 本报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徐飞

DNA,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份证”,终身不变的遗传标志,从犯罪现场遗留的生物组织和体液中分离DNA,是现代刑事案件侦破不可或缺的侦查手段。

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DNA实验室(以下简称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有一群身着白大褂的民警,他们用移液器充当利刃,让证据开口“说话”,为案件办理指明方向。

为死者言

今年1月,武汉市公安局江津区分局破获一起19年前的命案积案,民警通过不懈努力,从当年案发现场木板上提取到的模糊生物痕迹中,锁定了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

面对从天而降的民警,痕迹比对结果,犯罪嫌疑人李某最终承认自己19年前因一时冲动而酿成的惨剧。

人是抓到了,江津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队长胡斌却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原来,案件移送检察院过程中,检察官质疑:当年从案发现场找到的凶器木板上已经没有痕迹特征,如何证明与案件相关?

“我当时也有点犯难,因为19年前确实无法检测已经渗透进木板内的人体DNA。”为了让证据在诉讼过程中无懈可击,胡斌找到武汉公安DNA实验室副主任张春梅。

从业16年的张春梅,对微量DNA检测有过人之处,随着时间推移,生物组织会发生变化,如变黑、变灰直至无色,肉眼虽无法看出,但通过技术能让它“显形”。张春梅通过多次提取,最终在木板上检测到受害人的 人体DNA信息。

“进行DNA检测是一个复杂过程,要谋定而后动。”武汉公安DNA实验室主任方慧将DNA检测比作做手术,检测前要进行评判,“像制定手术方案一样”。

成立于1994年的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是全国第一批设立建设的DNA实验室。“经过近30年发展,从DNA提取、扩增、测序,再到最后比对,我们已形成一

套成熟的检测技术。”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教导员朱传红,是实验室建成以来最早一批研究微量生物检材的人。

早在2006年,朱传红就带领团队,在监控缺失、对象不明、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从犯罪现场一根塑料带上提取到人体微量组织细胞,为侦破要案指明了方向。

现如今,武汉公安DNA实验室年均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万余起,检验生物检材3万余起,年均揭露各类案件1500余起,先后获评“全国公安机关重点实验室”“全国公安机关一级DNA实验室”。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断开的证据链接上,形成闭环,用一份份报告发出公平正义的强音。”张春梅说。

助破小案

“DNA检测技术并不只用于重大大案事件。”朱传红介绍,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才的汇聚,DNA检测技术也更多地运用到一线实战中,在破小案、保民安中发挥关键作用。

2022年4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生物园、光谷科技港等地,连续发生多起企业、工地,小区空调外机铜管被盗案件,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选择夜间作案,从监控盲区下手,给案件侦办带来较大难度,有的报警人甚至自认倒霉。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民警吴玉剑博士可不这么想。

2021年,吴玉剑来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帮助筹建了该市第一家区公安分局DNA实验室。吴玉剑带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刑事技术团队持续跟进案件,通过多次勘查现场,对提取到的接触性生物物证进行检验,最终精准锁定嫌疑人,并依靠DNA信息深挖研判,串并其所犯同类案件6起。当年5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辖区盗窃空调外机铜管被盜案件发案数下降近八成。

“近年来,我们带专家、送技术、严审核,把DNA检测技术由市向区推广,得到广泛应用。”方慧介绍,从

2018年起,他们便开始筹划在区公安分局建设DNA实验室。为了让DNA检测技术更广泛地服务基层实战,方慧和同事们一道,累计培训技术骨干60余人次,从实验室管理维护、理论方法研究、技术难点操作、结论审核把关等“全环节”做好传帮带,给破案多提供一些帮助。

现如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DNA实验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DNA实验室已通过资质认定并投入运行,6所区公安分局实验室正在紧张筹建中。

服务民生

方慧清晰记得,苗苗和母亲抱头痛哭的场景,“当时我们也流泪了”。

1985年,1岁9个月的苗苗在江津区一长途客运站附近走失,此后30多年,苗苗的父母印了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踏遍20多个省份,见过200多个孩子,却一直未找到她。

自公安部“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通过不断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比对核查,最终在2021年助苗苗一家团圆。

“以前由于DNA信息库资源有限,可比对信息不足;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不断增加遗传标记,检测精确度也随之增加。就像进行网络搜索,关键词越多,搜索的内容越精确。”方慧说。

近年来,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采集血样189份,核查历年失踪被拐信息364条,先后找回26名历年失踪被拐儿童,组织开展十余场认亲活动。

2022年7月,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通过检验和数据比对,成功帮助66岁的老人与失散62年的同胞兄妹团聚,创下湖北省内认亲团圆最长的时间记录,这在全国也罕见。

通过DNA检测技术,每帮一个家庭团圆,对方慧和同事们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

“我们同事对找失踪被拐妇女儿童,有时比办案子还积极,他们说这是积德的事。”在方慧看来,这是“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真切体现。

“90后”法官谢芳的基层办案经历



图为谢芳(左一)通过“共享法庭”调解家事纠纷案。

德清县人民法院供图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旻

乌黑秀发简单扎在脑后,说话与工作风格如竹筒倒豆子般直爽利落。这就是谢芳,现任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一位“90后”年轻法官。

谢芳说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因有无数法院前辈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打下的扎实工作基础,年轻法官才能乘风而上,扬帆起航。

从实习到工作,谢芳迈入德清法院的大门业已10年,从书记员到法官助理再到员额法官,从执行局到基层人民法院再到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这10年间,经历了许多人事变迁,不变的是刚入职时给自己写下的座右铭:道阻且长,但求无愧于心;前路漫漫,风正好正是扬帆时。

扎根基层增强法治底色

“江南第一山”莫干山绿竹如海,山泉汩汩,别墅林立,广迎海内外游客,与这片土地共成长的还有莫干山人民法院和心怀梦想的法官们。

谢芳正是其中一员。

2015年开始,乡村旅游经济在莫干山如火如荼开展,数百民宿纷纷挂牌营业,与之一同到来的还有涉及农村房屋租赁、民宿投资开发等商事纠纷,让谢芳印象特别深的是法庭与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共同化解的一起因民宿产生噪音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纠纷。

谢芳与同事多次走访了解情况后才发现,两兄弟之间并非简单的因为哥哥家发展民宿影响了弟弟家的安宁产生冲突。原来,弟弟认为早年间宅基地分配不公,再加上在父母赡养问题上兄弟间产生分歧,最终在开发民宿过程中彻底闹翻,难以调和。

捋清了纠纷背后的历史脉络,联合调解力量针对各个矛盾点逐个击破,谢芳还与同事走访了解当年分配宅基地情况的老人,给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

脚步丈量莫干山的山水,谢芳也如同树苗在土地

上扎根更深。

在莫干山人民法庭工作期间,庭长常带着谢芳下村入户,给村民做农村土地法律知识宣讲。

由于村民们刚刚接触民宿经营行业,在签订合同时权益受损而不自知。谢芳在下村过程中就发现一些村民以固定价格一下子签署了30年租期的合同,这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租赁合同最长期限20年,对村民不公平也不利于当地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普法之外,谢芳与同事们为民宿经营者们提供租赁合同的范本,避免因合同约定不明产生更多的纠纷,还对有需求的民宿提供关于劳动保障、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进一步体会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几个字所赋予我们法院人的责任。”谢芳如是说。

家长里短探求法理平衡

德清法院有个“芬芳工作室”,是全省首个设立在人民法院的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名字由来正是院里多位女法官名字中的“芳”。谢芳也是“芬芳工作室”的主要成员之一。

从事家事审判工作期间,谢芳可谓看尽世间百态,见过为了争夺夫妻财产在法庭互撕的离婚夫妻,见过数个子女却老无可依的心酸老太太,见过在家暴中一直隐忍不敢维权的妇女……

“老母亲到法院起诉3个儿子,要求他们与自己分丈夫去世后留下的遗产。”这是谢芳办理过的一起看似离奇实则心酸的案件。

案件中的老母亲李老太腿脚不便,谢芳和法官助理专程上门后才了解到母亲起诉3个儿子的背后其实是李老太的养老问题。谢芳耐心听完李老太的哭诉,也联系上李老太的3个儿子,这才弄清这个家庭长期以来的矛盾症结所在。

原来,大儿子与二儿子认为母亲偏爱小儿子,多年来贴补小儿子更多,合该小儿子负责赡养,甚至还认为小儿子为父谋财实则将父母钱财挪作己用。而小兒

子对两个哥哥的误会气在心里,更不愿意赡养母亲以致落人口实。

在谢芳多次上门、电话联系释法说理后,小儿子也提供了银行流水辅助作证,一家人的心结总算解开。住在德清的小儿子表示愿意在今后的生活中多探望和照顾李老太,李老太和其他两个儿子也同意只要小儿子愿意多照顾老人可以给小儿子多分一些遗产。

“家事纠纷的法律关系并不难,难的是背后错杂复杂的情感关联和利益纠葛。”谢芳说。

从事家事审判两年间,谢芳共办理了400多件家事纠纷,调撤率高达74%。尽管法律与情理虽然不完全一致,但谢芳努力在其中找到平衡点,兼顾法与情,柔性化解更多的纠纷。

融入基层治理定分止争

谢芳刚上班的第一年,接触过有房东为了90元的水费将租客起诉至法院的案件。这样的案件让法官很无奈,案件虽小但法院仍需按规定发传票、送达、开庭,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而如今,随着全社会参与到调解工作中,调解力量不断壮大,“漏斗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格局逐渐形成。法院作为“漏斗”最下一层,收到的矛盾纠纷数量减少,法律关系也更复杂了。

在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工作5年,谢芳见证着法院的工作方式和职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不告不理”到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大格局,从法院单打独斗到合力构建非诉多元解纷机制。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立案庭庭长,谢芳也更多地承担起了诉源治理、定分止争的职责。

2022年,德清一房地产公司“暴雷”,尽管楼盘已经交付,但仍欠187户业主优惠房款。

“一百多人闹哄哄地围上来,无论我们说什么,大家都听不清楚继而声音更大。”这是谢芳在刚接触该案时的印象。

为了妥善化解纠纷,法院与住建局、房管处、矛调中心联合组成工作专班,多次与业主代表开协调会,寻求相对公正的方案尽量保障业主的利益。这样的群体性纠纷,每一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拿出相对公平的方案,让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才是化解纠纷的关键所在。

以公心探寻法律真谛,以真心化解矛盾纠纷。作为新时代的法院人,谢芳表示,自己将与身边并肩作战的法院人一起,转变思维,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诉源治理工作,在化解纠纷的同时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司法获得感。



②



③

三位边检老检查员的最后一个劳动节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霍小功
□ 本报通讯员 王羽

“101,203呼叫!”
“101收到,请讲。”
“飞机舱门已开,准备下客。”
“101收到!”

一架香港到海口的HU704航班降落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这是“五一”小长假最后一个航班。正在203岗位执行飞机舱口监护任务的是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老民警赵承绪,1982年入伍的他已有40余年工龄,今年10月即将退休。

“驾驶舱请打开,我们需要进行清舱检查。”看着最后一名旅客走下廊桥,精神抖擞的赵承绪进入机舱开展清舱检查,对待这项已经执行过成千上万人次的任务,他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驾驶舱,行李架、座椅、员工间、洗手间……锐利的双眼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一手拿着对讲机,一手举着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着整个清舱过程,他说:“我是‘拒马栏’,守好国门前的第一道防线是我的职责使命!”

对于重要的执勤任务,赵承绪在单位一待就半个月回不了家,有一次妻子生病严重也无法及时回去照顾,“虽然对家人有愧,但能够在特殊时刻守护国家安全,我觉得特别光荣,相信家人也能理解”。

当提到这是最后一个在岗的劳动节时,赵承绪却一改之前的严肃,感慨地说道:“肯定是很舍不得的。”

很快,该航班143名旅客就提着大小行李陆续进入边检入境查验大厅。“轮椅旅客请走这边。”站在台外的老检查员李守合,举手指向左边的“无障碍通道”,对刚从HU704航班下来坐着轮椅的旅客及其家属示意。

疏导旅客、提供咨询、维护检查台前秩序、观察旅客情况……临退休的李守合善解人意地说:“台上检查员辛苦,要尽量为他们缓解验放压力。”

李守合是广西人,1984年入伍时,他戴着大红花坐上了绿皮火车,“火车开了好一会儿,我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海南,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呢”。

回想当年来到海南的情景,李守合耳边仿佛响起了“匡匡匡匡”的火车声,在他的回忆里,最难忘的就是1989年在秀英港码头与战友们一起围堵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偷渡者,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十分惊险。

“其实我还想多干两年,退休后一下子歇下来可能很难适应,劳动抗老!哈哈!”李守合打趣地说,眼里却闪烁着不舍。

“Do you have a visa?”一名韩国籍旅客来到台前,戴着老花镜的老检查员张馨予操着流利的英语询问道,今年6月就要退休的她也是全省边检站中验证台上年龄最大的女检查员。

有人问张馨予年龄这么大,眼睛都快看不清了为什么还要上验证台?她总是回答说:“队里台上检查员紧缺,我能分担一点是一点,在台上都习以为常了!”

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她初当检查员的时候,还是在港口的一间仓库改造的出入境查验大厅里,验放章用的还是很重的大铁章,“时常要给铁章抠一抠印泥,免得看不清字了”。

说起近30年的检查员工作生涯,张馨予以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是我在岗位上最后一个劳动节了,能在这三尺验证台站到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刻,还是有点自豪的”。

28年来,从边防女兵到边检女警,从海港口岸到空港口岸,张馨予验放超过10万名出入境旅客。

当天20时15分,143名旅客全部验放完毕,海口美兰国门口岸又恢复了平静。

披星戴月去,迎着朝霞归,国门前青蓝携手、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仍在海口边检继续。



①

图① 赵承绪正在飞机舱口执行监护任务。

图② 张馨予正在对旅客证件进行查验。

图③ 李守合正在与出境旅游团领队核对人员信息。

美兰边检站供图